

近代中国两个大变局论断：比较、关联与时代启示

郑裕龙¹

(1. 武汉工程大学, 湖北 武汉 4302052)

摘要：“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李鸿章在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传统优势地位丧失的深刻变革中提出的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当今世界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两者在经济、政治、文化内涵上截然不同，却又在历史进程中紧密相连。通过比较两者差异，为理解当今中国所处的方位与抉择、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大变局；内涵；中国发展

基金项目：武汉工程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浅析近代中国两个“大变局”理论》（项目编号：CX2024469）的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312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长河中。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在面对世界发展的大势时，上书光绪皇帝“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的发展，得出当下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目前人类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

一、“大变局”论断的提出背景

大变局是对世界格局变化的认识和概括，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具有长远深刻的影响。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背景

1840 年，封闭了近百年的大清国被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国门。自此之后，西方列强相继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被强加于中国。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相继丧失，这是历史中的中国旷古未见之奇变。在近代中国，“变局”一词最早出现在 1844 年。秀才黄钧宰在《金壶七墨》谈及西方时不知“英法国何方也”，称之为“古今之变局哉”。虽然涉及到变局，但是对于这种认识仍处于朦胧状态。后续在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都偶有涉及变局一词。而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到当时社会之变，同时也让变局更为人所熟知的当属李鸿章。李鸿章在 1872 年 5 月上奏的奏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第一次正式的提出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一观点。在奏章中，李鸿章所论述的内容围绕着“海防”建设展开。历来备边多在西北，然欧洲诸国入侵势力皆自印度经过南洋而来，以此来论海防之重。两年之后在《筹议海防折》中，他通过比较古今之势，强调晚清的边防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形式，凸显海防的重要性，又再次提出“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虽然李鸿章所述只是围绕着边防的方位，旨在关心清王朝延续与否的问题，但李鸿章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局势形容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无疑触动了国运维艰时代下国人们的神经思绪。李鸿章的“未有”、“变局”很快为先进分子接受，形成当时对于世界认识的“变局观”，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清代末期的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统治者为了强化皇权至上的思想，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于当时的西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期的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海上霸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经历了宪章运动、议会改革、文官制度改革，维护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在

作者简介：郑裕龙（2000—），男，湖北咸宁人，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

世界上的垄断地位得到巩固。在法国，经历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更自由的君主立宪制；第二共和国建立普选权和新宪法；第二帝国引入自由主义改革；在普法战争后建立第三共和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共和政体。西方的冲击以鸦片战争的方式传到了日本。当时的日本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强烈的危机感促进了尚处于锁国状态的日本的现代化，自此开始了开国、倒幕、维新，迈向近代化之路^[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开拓殖民地，抢占海外贸易市场，英国率先打响侵略中国第一枪，其他西方列强紧随其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在数千年以来中国所习惯的农耕文明、内陆文明和面对西方国家迅速发展产生的海上文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碰撞、从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到坚船利炮下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变化当中所产生的。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背景

2014年8月，在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一概念。2017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我国驻外使节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提出了“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辩证的观点详细阐述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讲述了该命题的研判，对大变局中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分析。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世界上国家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从联合国最初建立时51个会员国，到现在增加至193个，其中增加的绝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是国际局势仍不平静，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与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不稳定性因素在量全球范围内持续增加。在科技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蓬勃兴起，科学技术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当前人类正处在以新材料、新能源、基因工程、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其深度和广度将超越前三次科技革命，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在革命中上独自发展。在这样的变化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过去的百余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经济上，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工业大国，从一个追赶者逐渐走入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参与者和领跑者。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绿色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政治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全面深化，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在不断得到加强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发展让西方发展模式弊端日益凸显，“中国模式”初步成功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二、“大变局”论断内涵差异性

尽管都是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却反映了两个相反方向的趋势。“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李鸿章基于中国的视角所做出的论断，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失去传统优势地位和“天朝上国”自我认同感的转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结构变迁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强调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而引发的世界格局之变。以下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进一步分析其内涵。

（一）经济发展

自中西经济交往以来，中国通过向西方输入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大量金属货币流入中国，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铺垫了基础。在明朝中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受制于多方因素制约，并没有发展壮大，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模式。康乾盛世以后，清王朝经济开始走向衰退。清政府在考量统治、安全等诸多因素后，不断管制对外贸易，逐渐形成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以此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主导了同时期的全球化进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自此之后，中西经济间的交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用一系列不平等的框架条约来重塑中西之间经济交往，改变了以往几千年来双方的交往规则。在经济领域中，中国从主导地位演变为被迫纳入西方世界市场之中、从商品对外输出转为西方主导的需求转换、从规则的制定者转化为被迫的接受者。自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到

新中国成立之间这个时期，中国被迫接受了上百个不平等条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三十年的时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瞩目成就。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等，中国仅用数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在202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经济体贡献率总和，中国正在从追赶者向领跑者转变，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世界经济中心也正在向东方移动。面对经济的发展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因势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中国通过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等相关政策不断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不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全国产业布局、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在这场变局中，与世界各国一同分享发展红利，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二）政治制度

明清时期标志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鼎盛阶段，明清两朝分别实行海禁、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1840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变局中，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一系列的内外战争给清王朝政治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太平天国运动后，晚清政府开始尝试现代化转型。慈禧太后从辛酉政变起实际成为清王朝最高政治权利的掌握者，这一权力变动对清政府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湘淮官员得到重用，地方掌握更大的权力，为清王朝在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调整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慈禧太后通过积极主动的态度，满足了列强在华利益的现实需要，列强也承认清王朝政权的合法统治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的稳定性。但是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体系内，权力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晚清王朝尝试现代化转型的彻底失败。战争的失败凸显了晚清政府在政治体制上的落后和腐败，展现了在现代战争冲突中，专制主义下的王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争夺皇权和满汉两族间的矛盾导致政府内部分裂，影响了决策的效率和统一性。地方势力的崛起，使得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同时也加速的地方军阀政治的形成，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对之后的政治局面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成为了体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经百年的世界政治格局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帝国主义构建了世界关系的新格局，这一体系下大国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为下一次变革种下了种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全球政治格局演变成了一个两极对峙的结构。这一时期，亚非拉地区逐渐建立起众多独立主权国家，超级大国的竞争深入第三世界国家。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格局日益疏朗，多极权力均衡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互动规则的制定中。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及其动态变化是分析世界政治格局变动的最基本考量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打破了西方固有的发展模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一发展时期，我国积极展现大国责任和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

（三）文化思想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特点，但在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下，古代中国的思想转变面临重大障碍。同时随着小农经济和君主专制体制的强化，政府同样会采取行动来加强对思想控制。西方文明的入侵冲击了儒家传统意识形态，为了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维护王朝的合法性，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意识形态，适应时局的发展。自先秦有记载以来，中国看待外部世界部世界一直采用“华夷之辩”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快速发展的物质文明给清王朝带来巨大冲击，变局观、自强求富观冲击着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外需和戎，内须变法”、“师夷长技以制夷”、“制洋器、采西学”等思想的提出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展开了学习西文西学、开办近代学堂、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等系列改革，但是晚清的意识形态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调整，最根本目的是加强和巩固王朝

专制统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化格局已经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调整，其中包括从东方到欧洲、再从欧洲到美国的转变。当前，世界文化格局正在展现新的发展态势，这不仅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显著标志，同时也在促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一步演变。长期以来，自诩“文明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个人至上、自由至上的理念呈现出侵略、破坏、反人类的行为特征，极大的扰乱了国家和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答案逐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符号^[4]。”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号召力、引领力、影响力的话语和倡议传播力显著增强，对于西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话语体制形成了有力抵制。在百年变局影响下，当代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推动世界文化朝着文化多样、力量多极、规则公正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文化力量。

三、“大变局”论断的内在联系与影响

虽然“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跨度不同，但它们都揭示了人类社会在特定时期所经历的重大转变，体现了全球视野下的历史变革。大变局理论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两个“大变局”论断之间的历史联系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背景、变革主题、历史影响和人类文明交汇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两个概念共同揭示了人类历史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重大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对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前者主要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而后者则涵盖了 20 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变革。这两个时期虽然时间跨度不同，但都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重要变革时期。从变革主题上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面貌，还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全球视野看，在这两个变革时期，人类文明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交汇与碰撞。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创新。同时，这些变革也带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需要人类社会携手共同面对和解决。

（二）两个“大变局”论断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1.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关键时期，大变局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回望历史，要更加明确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大态势，中国面临的大态势，深刻体会两者彼此影响、互为因果，持续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首先要坚持推动改革开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也要持续深化国内改革，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要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刻调整，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加强与国际产业的合作与竞争。同时，中国也应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最后，要不断激发创新活力。面对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中国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能力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同时，中国也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强与国际科技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战略引领，全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启示

在两个大变局论断中，都通过积极倡导改变来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今天，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式，大变局论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也伴随着更多的挑战和风险。因此，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这要求在外交政策中,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其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这些挑战。通过加强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更具影响力和感召力。最后,强化外交队伍建设。高质量的外交工作需要高素质的外交人才。中国应加强外交队伍建设和培训,提高外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应变能力,为更好地执行外交政策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三) 两个“大变局”论断对世界的意义与价值

1. 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变革的推动

大变局论断揭示了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两个大变局的时间段体现了国家间力量的变化,也体现出权利自西向东的移动过程。今天,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美西方实力相对衰落,全球治理依托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松动乃至瓦解的风险。此外,大国退出全球治理机制、全球治理规则滞后等问题也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这要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先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更新和完善。其次,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这要求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推动其向更加包容、平等的方向发展,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最后,倡导国际合作与对话,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

2.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促进作用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的是欧洲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的成长,他们要求通过殖民扩张和贸易掠夺,积累大量财富和资源,实力迅速增长,这对对亚非拉等地区的传统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强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要推动实现全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再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推动国际合作与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论断揭示了推动国际合作与对话的深化,帮助各国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次是倡导共同发展与繁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倡导各国加强经济合作与发展,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种合作与发展有助于缩小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提供了时代背景与理论支撑、推动国际合作与对话、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以及倡导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些促进作用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

四、“大变局”论断的结局

大变局对中国而言,是转变也是机遇。面对这一大变局,一百多年前和今天,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自然也会呈现出不同前途命运。

(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晚清时期士大夫对内和对外认识产生了新的变化,由此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变化。随着实践的深入,又进一步催化了思想内涵的深刻,近代中国要不要现代化,如何推动现代化发展,如何走向政治的现代化。晚清的第一次社会变革洋务运动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实际行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但是纵观整个洋务运动的进程,因为其领导者深受儒家思想浸染,难以超越君王正統的格调,因此始终没能真正做到西学。随后的第二次社会变革戊戌变法,尽管进一步主张西学,开启民主运动,推进了民主化变革,但是因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清末新政是晚清的第三次社会变革,这也是历次变革中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从中体西用上上升到了中西合用^[5]。新政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制度等多方面推行,力求挽回大清王朝,但是对于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的清王朝已是为时已晚,各项制度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告终。面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为强国之梦付出了一系列努力,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中国并没有走上富强道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推移发展,社会矛盾反而更加尖锐。近代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始终没有改变,也没有办法使中国富强。

(二) 数年后回眸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认识;在实践层面,也制定并实施了应对这一变局的策略和方案。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互动,为应对新型国际风险挑战、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实践目标和价值导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坚定不移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抓住这一发展的机遇期,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中国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坚持推动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通过合作的手段来预估、掌控可能到来的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在这个背景下,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发展关系,不断地提高国际治理能力,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带来的红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实质上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引领全球发展潮流。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眸这一历史变迁时,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发达国家对他们成长的回应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共赢,建设了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五、结语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回应,深刻地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寻找未来的方向。一百年后,从千年大变局到百年大变局,世界处于新的大发展大变革调整时期,中国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近代中国的两个“大变局”论断,分别标志着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通过深入剖析这两个变局的背景、内涵及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所处的方位与抉择,为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罗立东.晚清的内忧外患与日本近代化[J].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03):183-188.
- [2]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朱世龙,涂志明.红色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关联[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1-8.
- [4]杨佳江,倪国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及发展变化[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06):1-7.
- [5]王春娟.晚清三次变革与现代化思想的变迁——从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变化观之[J].世纪桥,2003,(04):61-62.

The two major transformations in modern China: comparison, corre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Zheng yulong¹

1.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bei Wuhan 4302053

Abstract: "A profound change unprecedented in three thousand years" was the judgment made by Li Hongzhang in the face of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superiority. The two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yet they ar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By comparing their differences, we can gain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 and choices faced by China today, and into promoting China's goal of becoming a modernized powerful nation.

Keywords: "major changes"; "connotation"; "China's development"